

中国古代史讲义

第二册

兰州大学历史中国古代史教研组翻印

一九七七年五月

第五章

三国、两晋、南北朝。 阶级斗争、民族斗争 的发展和南方经济 的上升

第一节 魏、蜀、吴三国分立 和西晋的短期统一

一、黄巾起义失败后地主阶级重建封建统治

(三国分立局面的形成) 轰轰烈烈的黄巾运动虽然被东汉政府军队和豪强地主的私兵镇压下去了，但是地主阶级在政

治上的统治秩序已被打乱，要想恢复东汉政权对全国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了。

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北方各地豪强地主扩大了原有的私兵队伍，形成武装割据，东汉各州郡的官吏也纷纷扩充势力，与地主武装相结合，各霸一方，这些封建割据者明争暗斗，都想窃取农民战争的胜利果实，争夺统治权力。

公元189年，洛阳宫廷中爆发了以外戚何进和世家大族的代表袁绍为一方，以宦官为另一方的激烈斗争。何进打击盘根错节的宦官势力，并密令在河内驻军的并州牧董卓入京。宦官先发制人，杀了何进，袁绍又勒兵杀了宦官二千多人。接着，董卓带兵开进洛阳，另立刘协为帝（汉献帝），逼走袁绍、曹操等人，独揽朝权。董卓的专横，洛阳的混乱，使各地的分裂割据活动迅速加剧，州郡牧守各树一帜，以袁绍为盟主，联合讨伐董卓，进屯洛阳周围。公元190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西走长安，并把洛阳周围二百里内破坏的一切如洗。不久，董卓在关中被部将杀死，北方混战继续发展。

参加混战的一个重要人物是曹操，曹操是以镇压黄巾运动起家的。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刚刚兴起的时候，曹操带兵镇压了正在兖州前进的颍川黄巾。公元192年，曹操镇压了后起黄巾中最大的一支，即青州黄巾，并且强制改编青州黄巾三十万人作为自己的封建军队，称为青州兵。公元196年，曹操又一次镇压了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部，夺得了大批耕牛农具。在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长期武装搏斗中，曹操始终是农民阶级的一个最凶恶最顽固的阶级敌人，但是，在大大小小的地主阶级的割据中，曹操又是一个比较有远见、有能力的人物。

公元196年，曹操把东汉傀儡皇帝汉献帝刘协，挟持到许昌（今河南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地位。从公元196年开始，曹操继续在许昌等地强制军士和农民屯田，以作

取军民血汗，积聚军粮。因此，他在北方各地割据者中，又取得了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优势。这样，曹操就凭借着起义农民的刀锋凭借优势力量，在以后的十年中逐步削平州郡各霸一方的封建割据势力，成了农民起义失败后地主阶级重建封建统治的英雄。

二世纪末年，曹操占有兖、豫二州（今山东西南、河南省大部分）之地；而袁绍则占幽、冀、青、并四州（今山西、河北以及小东北部、河南北部），是北方最强大的势力。公元200年，袁、曹两军在今河南省中牟境内进行了官渡之战。当时袁军十万，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但政治黑暗，军心涣散；曹军不满万人，军粮又缺，处境不稳，居于劣势，但是，作战指挥却比较正确。曹军采取了以未破和偷袭粮屯的战法，击溃袁军，全歼袁军主力，取得了全局的胜利。以后数年，曹操占领了袁绍的全部根据地，并打败了在这面一带与袁氏的残余势力勾结的乌桓单于，保障了北方的统一。

公元208年，曹操率军南下，企图夺取刘表割据的荆州，然后南下攻占江东。正在这时，刘表病死，刘表子刘琮向曹操投降。依居于荆州的刘备为曹操所逼，向南奔逃。他派遣诸葛亮到柴桑（今江西九江），与割据江东的孙权结盟，共抗曹军于赤壁（今湖北嘉鱼境）。这次战役，曹军近三十万，号称八十万，而孙刘联军只有五万左右。但是，曹军远道疲劳，又有疫病，战斗力逐渐减弱，东吴主帅周瑜乘东南风纵火焚烧曹军水师，与刘备军水陆并进，迫使曹操退回北方。这就是以少胜多、决定南北相持局面的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以后，孙权稳定地统治了长江下游的扬州（今苏、浙、皖、赣、闽等省地区）。原来孙权的父亲孙坚在江南镇压过农民起义，以后又参加了镇压北方黄巾军以及今湖南、江西境内农民起义的战争，壮大了自己的势力。所以，孙权的统治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产物。

长江上游的益州（今四川又文、武、彭、汉、南、犍、涪、江、永、南、江、内、江、等县）刘备的新据点。益州在公元184年，发生了马相、赵祖龙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以黄巾为首，达万余人，四川的大多数民族也起兵响应。他们杀县令、刺史、称天子，控制了今四川大部分地区。这次起义被镇压下去后，益州的统治权落入东汉宗室刘焉之手。刘焉入益州后，于公元194年，从刘焉之子刘璋手中夺得益州的统治权。但是，刘焉原来在荆州的地盘，却逐步为孙权所夺。

公元220年，曹操的儿子曹丕，废掉东汉傀儡皇帝汉献帝，在洛阳正式建魏国。第二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后代称元为蜀。公元222年，蜀大军出长江三峡，与吴陆逊军相持于夷陵（今湖北宜昌境），被处于劣势的吴军火攻击退回蜀，放弃了从孙权手中夺取荆州的企图。这就是有名的夷陵之战（也称猇亭之战）。公元229年，孙权也在建业（今南京）称帝，正式建吴国。中国历史上魏、蜀、吴三国分立局面，就这样形成了。

（三国人民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魏国是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压榨和豪强兼并战争所造成的废墟上建立的封建国家。勤劳勇敢的北方人民把一块又一块的地开辟出来，精耕细作，获得了较高的收成。他们恢复和新修了许多水利工程，凿通一些运河，保证了农田灌溉和交通运输的需要。洛阳附近农田特多，其它各地的荒残面貌也逐步改观，流散四方的人们，陆续回乡生产。淮河流域数万户的屯田区，繁殖规模很大，每年生产所得除屯田费用外，还有积谷达百万斛，被封建国家榨取。冶铁纺织等手工业生产陆续恢复起来。破烂不堪的道路也得到修葺。商品交换关系逐步正常化。洛阳、邺城成为当时北方比较繁华的工商业都市。

北方农业生产恢复，屯田制起了很大的作用。曹操在196年许都屯田收到成效后，立刻把屯田制广泛推行。屯田区一般都没在肥沃易垦之处或其它重要处所，不归郡县，而归典农中郎将

大农仅耕种一小块土地，维持生计。土地归国家所有，有权属封建国家，屯田民（也称屯田客）就是国家的佃户。他们分种国家大地，按田头分（用官牛耕）或对分（不用官牛耕），向国家缴纳封建地租。屯田民不承担另外的徭役，农时要有保障，而且在技术上讲究精耕细作，不强求扩大耕种面积，有利于提高产量，保证封建国家的需要。但在封建剥削制度下，屯田农民享受不到自己创造的劳动果实，他们在提供地租以外，自己往往衣食不继，衣不果腹，有时甚至不得不种植本来是野生的粮食作物。有许多屯田农民，在农民起义中本来已摆脱了官府和地主的控制，曹操推行屯田制，又给他们套上了沉重的封建枷锁。

至于自耕农民，受封建剥削也很沉重。他们耕种的国家土地要向官府缴纳口粮，叫做田租；每户人家还要缴纳两匹绢、两匹棉，叫做户调，租调以外，还要服役的负担更是沉重不堪。有时，家内全部男子都要被迫当兵。

有压迫必有反抗。公元211年，田畴起义于河间；215年，屯田客吕布起义于陈仓；219年，南阳人民反对徭役而起义；219年，孙根起义于陈浑；225年，荆城郡头领方起义，农民响应。至于屯田客的大量逃亡，为数就更多了。

在南方，新蜀辅政的诸葛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225年，他领兵平定了今川西、云贵地区夷人的反抗。蜀国政权也进行了征服境内少数民族的战争，各族统治者挑起民族不和，但是，汉族人民同夷人、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都维持并发展了正常的交往。他们共同努力，进一步开发了我国南方的辽阔土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发展了手工业生产。蜀、吴地区除了冶铸业有所发展外，蜀国的织锦、文井煮盐，吴国的造船、制盐，都比较发达。大船能载二三千人，海船经常北航辽东，南通南海。公元230年，吴国船队到达夷州（即今台湾省），这是大陆与台湾交通的最早记载。

(世家大族势力的发展 司马氏以篡魏) 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肥了地主阶级，晋境内部形成了一些有霸一方的大族地主。吴国的大族在政治上世袭领兵，高官厚禄，在经济上则是“牛马横原隰，田池布千里”（《抱朴子·吴失》）。大族地主的发展给农民带来了灾难，贫苦的农民时常举行暴动，以反抗大族地主的统治。

北方地主阶级的发展情况比较复杂。在战争过程中，曹操把北方大批的豪强地主和士大夫收揽在自己的周围，让他们帮助自己进行统治，但总也有一部分豪强地主和士大夫不愿亲附曹操，有的还操纵地主阶级的舆论，反对曹操。曹操先后杀掉不少反对自己的士人，又命州郡官吏有察豪强，“重豪强兼并之法”。曹操还屡次颁布“唯才是举”的法令，责成所属把那些由于“德行”不好（不附合儒家的道德标准）、出身不显贵而受到地主阶级舆论非议但有治术用兵才能的人，选拔出来做官。这种政治措施，起了抑制世家大族独揽政权，扩大地主阶级政权基础的作用。

曹氏统治时，建立了“九品中正”制。选择善于鉴别人材的中史官员，兼任其本郡的“中正”官，由“中正”负责查问察访与他们同籍贯的散在各地的士人，评为九个品级，作为中史吏部选派官吏的依据。九品中正制初行时，其目的还是把评定士人的权柄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以遏止世家大族煽动舆论，操纵用官。但是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势力，仍然在迅速发展。

以后，世家大族的代表司马懿逐渐掌握了朝政。在他的庇护下，大族地主和官吏极力兼并农民，侵占封建国家的土地，侵占叫做“租牛客户”的国家佃户，以扩充自己的经济力量，屯田制度逐渐破坏了。在司马氏统治下，九品中正制也成为世家大族垄断政权，培植势力的重要工具。司马氏得到世家大族的拥护，势力越来越大。公元263年，魏灭蜀，265年，司马懿之孙司马炎终于正式夺取魏国的政权，建立晋朝。280年，晋灭吴，形成

了短期削弱北统八局面。

二、西晋的腐朽统治和各 族人民的起义斗争

（残酷的剥削和腐朽的统治） 司马氏早在建立晋朝之前，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新贵族集团。晋武帝司马炎依靠这个集团取得政权，自然要满足新贵族对财富和权势的贪得无厌的欲望，让他们任意宰割人民。公元280年，西晋颁行的户调式，就是保障地主经济特权的一种制度。

户调式包括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三部分。

占田制规定男子可以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此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三十亩，所谓占田，是指农民保有土地数量的一个假定的指标，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所谓课田，则是农民应缴田租和土地数量。无论农民中的男子有没有五十亩地都按五十亩征收田租。根据《初学记》的记载，西晋田租实际上是按照一丁课田五十亩计算，每亩纳田租八升，合计四斛。这比起曹操时田租每亩四升来，剥削增加了八倍。

户调制规定，丁男之户每年调绢三匹，绵三斤，次男或户者折半。丁男户调比起曹操时每户绢二匹，绵二斤来，也增加了六分之一。

田租户调实际征收时，官吏预先把各户资产多少划为九等，按等决定应缴租数调数，而以上述制度规定的数字为平均指标，叫做“九品混通”。这种方法看起来似乎照顾到实际的贫富差别，但是，地主官吏任意划分户等以转嫁负担，吃亏的还是贫苦农民。

品官占田荫客制度规定，官阶地主可以按照官品高低，占有

十顷以上至五十顷土地，占有一户以上至十户佃户和若干农奴，其以奴隶的仆役）。这样就从法律上保障了官僚地主占有土地和佃户的封建特权。至于占有土地佃户数量上的限制，只不过是口头空谈而已。何况制度还规定了，他们“庇荫”亲属（以贫穷的族人作为自己的荫户，即依附农民），在数量上实际是没有限制的。所以，西晋时占权的官僚地主，许多都是奴隶佃户或百户户，园田水碓遍于各地。

以司马氏为首的贵族集团，非常贪婪、奢侈、腐败、残暴。何曾、何劭父子日食之需达八两万钱，这些居官靠抢劫发财。官僚贵族竞相斗富，以显示自己的豪华奢侈。王恺拿出晋武帝所赐高义父的珊瑚向石崇夸耀，石崇顺手击碎，拿出自己的珊瑚树来，高义父竟有六七株之多。所以当时有人说：“奢侈之费，甚于天灾”，也有人作《钱神论》以讽刺当政者嗜财如命，贪略整个黑暗统治。

（八王之乱）西晋统治集团的腐朽，引起了激烈的党争，朝廷长期处于争权夺利的倾轧中。晋武帝为了统治人民，为了削弱异姓地主和惩罚地主，曾大封宗室为王，并且允许王出置军，取消州郡武备。他还陆续用诸王统帅中央兵马镇守要害，特别是荆、扬和关中，逐渐替换异姓方镇。强大的诸王回到中央，就成了朝政的操纵者。这就是《晋书·八王列传序》所说的“出拥旌节，苞并牧之荣；入践台阁，履端股之重”。

公元290年，晋武帝死，继位的晋惠帝是个白痴，惠帝皇后贾氏为了使自己的家族垄断政权，于291年诏征都督荆州军事的楚王玮入京，利用禁军力量，杀掉当政的惠帝外祖杨骏，“八王之乱”从此开始。贾后又命楚王玮杀掉继杨骏之后当政的汝南王亮和丁璠，然后又把楚王玮杀掉。赵王伦掌握了禁军势力，杀贾后，另与公元301年度惠帝自立。同年齐王冏（镇许昌）、成都王颖

(潁郡)、河间王颢(鎮关中)等起兵声讨赵王伦,其他诸王也率军纷纷卷入内战。内战的战场从洛阳扩大到黄河南北的广大地区,又扩大到关中。破坏性十分巨大。赵王伦被杀后,惠帝复位。各王之间的冲突仍然反复进行。幽州刺史王浚和范阳王虓甚至引乌桓、鲜卑兵参战,乌桓、鲜卑兵先后攻入鄴和长安,暴掠妇女财货,屠杀人民,其它诸王军队,也无不到处烧杀洗劫,使北方生产受到极大的摧残,人民受到极大的痛苦。由于八王之乱而加重了天灾和瘟疫,又夺走了无数人民的生命,逼得无数人破产流亡。公元306年,西晋政权落入东晋王羲手中,世袭称惠帝,拥戴怀帝,结束了延续十六年之久的八王之乱。但灾难深重的各族人民已经被逼到忍无可忍的地步,武装起义的形势早已完全成熟了。

(西、北边境各族人民的痛苦生活) 公元二世纪以来,西、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陆续向内地迁移,在今山西、河北、山西、陕西和甘肃一带,同汉人交错居住。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都在向上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走着封建化道路,由定居的牧业生活或半农半牧的生活过渡,部落的血缘联系着地减弱了。西晋的统治者为了控制他们和补充内地劳动人手之不足,有些也招引或强迫他们进入内地。进入内地的民族主要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五种,历史上称为“五胡”。其中匈奴从内蒙古南部进入陕、晋、羯人随匈奴人进入山西,主要聚居在上党武乡(今榆社县);鲜卑族的慕容部从辽西向南发展;鲜卑族的拓跋部从内蒙古进入晋北;氐人和羌人则从甘、青进入陕西。

这些少数民族由游牧转向定居农耕,由封建社会以前的制度向封建制度过渡,是民族进步的表现。但这一历史转变却充满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因而也充满了激烈的反抗斗争。

内迁各族的贵族分子,力图保持自己传统的部落特权,尽量利用部落血缘关系,束缚和压迫剥削本族人民。汉族地主阶级也

对他们百般欺凌，驱使他们当兵服役。山西的官府地主，掠夺少数民族人民为佃客，受的一家达数千人。捕捉少数民族人民转卖为奴，是常见的事，匈奴人、羯人、鲜卑人沦为汉族地主的奴婢的，为数不少。出身部落小帅的羯人石勒当过佃客，还曾为人拥耕，后来又被迫变为耕奴。他备受汉族地主的虐待和摧残，九死一生，从他的经历中，可以看到少数民族人民共同的悲惨遭遇和命运。所以，西晋建国以来，少数民族的以晋斗争就不断出现。公元290年，匈奴在上党起兵。两年后，匈奴人再次起兵，关中的氐人、羌人都起来响应，并推举氐帅苻丕为帝，大败西晋吴王军。

(汉族流民和各族人民起义) 三世纪末到四世纪初年，南北各地，由于统治者剥削和压迫造成的新/背井的流民，依计总数超过八百万人，他们饱受饥寒之苦，蕴藏着反晋起义的火种。

由于吴中军政的残杀而被迫流亡的蛮人(蛮人是今住四川境内的一种少数民族，后来进入陕甘地区，与当地胡人有一定程度的融合)、汉人、巴人甚多，进入益州，分散各地，替地主拥工。西晋统治者害怕他们造反，强令归还本土，益州官吏更是对他们严加催逼，限令立即迁回籍境。流民要求投过函关，等秋后积攒一点路费再走，也没有得到许可。有些官吏甚至谋杀流民首领，并在流民归途中设立关卡，掠夺流民财物。流民在统治者被迫下，两三万人集中绵竹一带，以求自卫。西晋统治者又发兵包围绵竹，进攻流民。公元311年冬，流民推举蛮人豪强李特为首，起义反晋。益州人民苦于官府摧残，同情和支持流民的斗争。李特与他们约法三章，救济穷人、整肃法纪，在他们支持下，取得了许多次战斗的胜利，益州地主则自设坞堡工事，虎视眈眈地窥测着起义军的行动。李特对他们没有保持足够的警惕，反而把流民分散到各个坞堡就食。西晋官军与地主武装里应外合，击

败起义军，李特英勇战死。李特弟李流、子李雄率领流民继续斗争，终于在公元304年攻克成都，占领了益州全境。

当李流、李雄起义军攻占益州的时候，西晋统治者强征荆州人民前往镇压，沿途郡县又强迫被征发的人民，不准在路上停留休息，他们不愿为统治者卖命，纷纷相聚反抗。303年，义阳蛮（蛮是当时荆州境内的一种少数民族）张昌召集避役的人和进入当地的流民共数千人，起义反晋。长江、汉水一带的汉族和蛮族人民群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三万人，并且陆续占领了襄阳、武昌。由李冰率领的一支起义军，沿长江东下，一直打到建康。长江中游以下的南北两岸的广大地区，一时都为起义军所控制。

关中流民散在南阳一带，西晋统治者派军队押送他们回乡，激起了他们的反抗，头如领导的八部流民杀来押送的官军，其他流民首领也率众起义，起义队伍扩大到四万多人，转战汉水流域。流亡在荆、湘的益州流民，生活无着，又受当地地主迫害，痛苦很深，群起反抗。残暴的统治者把参加反抗斗争的流民八十万人投入江中，把他们的妻子没为奴婢，随便赏赐给官僚地主，并且阴谋把流民统统杀害。流民走投无路，四五万家同时起义，以杜弢为首，攻克长沙和今湖南大部分地区，向北打到武昌附近。起义群众在优势敌人的围攻中，前后数十战，历时六个月，宁死不屈。

当长江流域的起义军英勇奋战，使西晋统治者陷于今崩离析的时候，北方人民也向西晋统治者展开了殊死斗争。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利用这种形势，乘机率领匈奴人在并州（今山西境内）起兵反晋。水深火热中的北方人民，纷纷投奔刘渊。有些豪强地主为了保持和扩大势力，也率众投靠刘渊。刘渊建立了以匈奴贵族为主干的政权，很快占领了并州全境。

接着，羯人石勒和马牧场的牧户汲桑起义于山东、河北。他们率领农民、牧民，攻打郡县，杀戮官吏和士族地主，以次月盖

起义，后来起义形势不利，石勒带兵投奔刘渊。

与此同时，刘伯根在山东，利用宗教组织起义，聚集了上万群众。刘伯根失败后，王弥带领群众继续斗争，一直打到洛阳城下。豫州（今河南境）境内几万户流民，受到当地地主迫害，烧城邑，杀官吏，响应王弥，后来王弥也投奔了刘渊。

刘渊得到石勒、王弥支持，势力伸展到中原地区。311年，匈奴人攻下洛阳，316年，又攻下长安，西晋灭亡。

十几年的阶级大搏斗震荡着长江和黄河，彻底瓦解了西晋统治，终于被摧毁了。历史总是在反复证明着：“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

西晋末年的汉族流民和各族人民起义，情况非常复杂。参加起义斗争的，有我国境内汉、蜀、秦、巴、羌、匈奴、羯等许多民族的群众。他们都受到官府和地主的压榨和欺凌，都有革命的要求。衣食无着的流民，更是起义的巨大动力。他们突破了民族界限，互相联系，彼此声援，共同进行了反晋的正义斗争。同时，西晋反动统治所造成的灾难，使一些不当权的地主和官吏，官更，也不得不流亡异乡；一部分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也受到某些损害。这些人进入人民起义行列，往往成为各支起义军的领袖。例如李特是蜀豪，张昌是县吏，王如为州武吏，杜骥和刘伯根都是县令，王弥的父祖都是郡太守。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划清两个阶级的界限，而往往与西晋官府发生各种联系，乘机取利。有些起义军头更是另有企图，斗争不坚决，遇到挫折或引诱，就变节投敌。因此，群众斗争虽然很英勇，西晋政权又不是强大的对手，而起义仍然难于持久，分散的斗争终于没有汇合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各少数民族人民参加起义，虽然也包含了一定的民族因素，但是总的来说，其主要性质仍然是阶级斗争。可是，一些少数民族

族的胥脑，如匈奴贵族刘渊等人，情况就另是一样。他们既早就抱有扩大民族矛盾以树立自己势力的野心，当西晋瓦解后，也就更公开地把人民起义引向对立，不分青红皂白地屠杀汉人，把民族压迫强加在汉人头上，这样，北方的社会矛盾状况就发生了变化。北方人民的阶级斗争，在一个时期内也就以汉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的形式出现了。

第二节 东晋、南朝时期社会 经济的发展 南方的 农民起义

一、北方胡族统治者的南侵 和南方人民的自卫战争

〔北方汉人的南迁〕 西晋灭亡以后，晋宗室司马睿，于公元317年在建康（今南京市）建立东晋政权，逐步统治了南方的广大地区。

这个时期的北方，进入了中国历史上的所谓“五胡十六国”时期，各胡族贵族相继建立政权，民族征服战争连绵不断，汉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命财产不保。他们除了寻找机会举行起义以外，还随着北方政治局势的变化，一批又一批地向南方迁移。这时候，南迁是北方汉人反对民族压迫的一种形式。

南方的北方人民，多是按籍相聚若干家，形成一个流民群，举家迁徙。在南行的道路上，他们常常受到胡族骑兵的蹂躏，地主武装的抢劫，饥寒和饥疫病的折磨，颠沛流离，死亡相枕。流徙着的人，也不得不妻离子散，痛苦不堪。可是，带着大批宗族、部曲南逃的晋朝官僚地主，却在沿途想方设法兼并流民，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私属以自。

备受千辛万苦，经历各种艰险，来到南方的北方汉人，当时被称为侨人，编入南方政府户籍的侨人，总数有七十万。无户籍的侨人还很多，叫做浮浪人。侨人虽然摆脱了民族压迫的苦难，但是又重新陷入阶级压迫的罗网之中。他们或者被迫沦为官僚地主的奴隶，部曲、佃客，或者占荒耕垦，或者逐食流移，处境十分悲惨。

为了控制侨人，东晋时在侨人比较集中的地方陆续建立许多与侨人旧土同名的侨州、侨郡、侨县。这些侨立的州、郡、县时合时分，境界又太狭隘。侨立州、郡、县内并不全是侨人，例如侨立的南徐州内，侨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二，这是比例最大的。旧有郡县内也有一部分侨人。由于侨属状况复杂，东晋政权控制力量很弱，所以东晋、南朝政府户籍非常紊乱。

侨人在南方历久年深，同南方土著农民在习俗上逐渐生活上的差别越来越小。封建国家为了榨取侨人的租赋劳役和驱使他们当兵，一面用“土断”的办法来加强对侨人的管理，土断有的是把散居侨人编入所在籍贯，有的是并户没有突出的或民户太少的侨郡县，有的是整顿户籍，把侨人和旧人分别立为白籍和黄籍。土断的繁苛，更加重了侨人的痛苦。

（祖逖和桓温的北伐）南来的北方汉族人民，仇恨北方的胡族统治者，希望东晋政权能够实现他们的北伐中原的要求。但是东晋统治者纠缠在争权夺利的复杂的矛盾中，很少以北伐为念。从洛阳南来的寄居东口（今江苏镇江）的祖逖，桓

然“以中为已低”（《世说新语·赏誉》注引），首先要求向北进军。他上书司马睿，分析了当时形势，陈述了北方人民反对民族压迫强烈愿望，也估计到北方汉族地主可以合作抗胡。公元313年，祖逖率领百余家部曲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击楫发誓说：“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晋书·祖逖传》）他剑豪迈誓言，表达了汉人反对民族压迫^迫壮志。

祖逖在江北召集流散人民，扩充队伍，冶炼兵器，屯田积谷，北进军河南一带，控制了—些地主武装，加以利用。不到八年，祖逖军收复了黄河以南大部分土地，迫使胡人不敢过黄河。就在这时，晋元帝司马睿派戴渊指挥江北军事，扼制祖逖。同时，东晋统治者内部明争暗斗非常激烈，内战自在眉睫，这种种情况使祖逖忧愤成疾，321年病死军中，北伐停顿。

祖逖以后，镇守荆州的庾亮、庾翼，相继请求北伐，由于朝廷的反对而未成功。后来，桓温坐镇荆州，于公元347年灭蜀人李氏在蜀中建立的汉国（即成汉的成国），声势很大。桓温请求北伐，东晋朝廷对桓温有疑虑，所以另派外戚褚裒于349年北伐。褚裒进攻彭城时，北方人民来归的日以千计，曹郗氏为百余家附晋。河北民二十多万运道来奔，由于褚裒一触即溃，使他们在半路上陷于困境。以后殷琨北伐，也于353年失败。

公元354年，桓温北伐前秦，进入关中，受到关中人民的热烈欢迎，但是桓温不愿损耗实力，错失时机，无功而返。366年，桓温第六次北伐，收复洛阳，徙民而归。369年，桓温第三次北伐，从扬州进抵枋头（今河南浚县）。前燕在前秦援助下，截断了晋军粮道，桓温败回南方。

东晋统治集团口头上关于北伐的喧嚣，多于实际的北伐行动。少数人实行北伐的人，除了祖逖以外，又陷于东晋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矛盾之中。把北伐斗争同争权夺利的活动纠缠在一起，不能全力以赴。更多的官僚则由于在南方产业已丰，不

是“含安水之固，逐日乱之乡”（《晋书·孙楚传附孙綽传》）。不但无北伐，而且还阻止别人北伐。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群众对南北统一的渴望，始终无法实现。

（胡族统治者的南侵和淝水之战）在东晋统治者不愿主动出击，北伐毫无希望的时候，北方的胡族统治者屡次陈兵长江，矛头指向健康，形成十分尖锐的南北民族矛盾。由于南方人民不屈的斗争，由于北方内部形势的极不稳定，胡族统治者的南侵都没有得逞。

公元四世纪下半叶，前秦的氏族统治者苻坚暂时统一了中国北方。公元三八三年，苻坚以数十万兵力进攻南方，前锋三十万攻陷寿阳（今安徽寿县）。在强敌入境，民族危亡之际，南方义士和广大的人民群众都盼望重整旗鼓，保卫南方。与苻坚对阵的东晋北府兵，是刚刚在京口（今江苏镇江）、甬东由北方的南归人民或其子孙组成的一支劲旅。他们人数不满十万，与苻坚军相比，数量上居绝对劣势，但是他们饱尝民族压迫之苦，士气高昂，都准备奋勇作战，誓歼入侵之敌。

前秦打算在寿阳一带利用优势兵力，一举消灭北府兵，灭亡东晋，以奴役南方人民。北府兵将领谢安、谢玄、谢琰等了不到秦军森实，准备乘秦军还未完全集结的时机，主动出击秦军前锋，瓦解秦军。北府兵主动出击，取得了首战的决定胜利，然后与退淝水东岸的秦军相约，到淝水西岸决战。秦军企图乘晋军半渡淝水时加以袭击，所以引兵稍退。但是秦军内部不稳，一退不可复止，顿时自相残踏，溃散奔逃。晋军抓住时机，渡过淝水，展开反攻，打乱了秦军的部署，获得了巨大胜利。前秦溃军兵在路上听到风声鹤唳，都以为东晋兵追来了。他们昼夜奔跑，不敢停歇，死亡惨重。这样，前秦的大规模入侵，就被北府兵彻底粉碎了。

前秦内部本来就有民族矛盾重重，在这次不义的南侵战争中